

国外学者视阈下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

嵇明亮

【内容提要】“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是国外学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国外学者的研究涉及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判断、重大变化、主要目标、实施策略和面临的挑战等多方面问题。国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判断是：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正在重塑世界，重大变化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从“韬光养晦”到“更加积极有为”，其主要目标是不断谋求全球影响力，主要实施策略是推进新型“统一战线”，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既来自其外交层面本身，同时也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

【关键词】 习近平 新时代 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嵇明亮（1986-），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 100038）。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将走向何方？国外学术界随即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热议和解读。国外学者基于国际战略形势判断和地缘政治格局考虑的视角，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判断、重大变化、主要目标、实施策略和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基本判断：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正在重塑世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政策的提出、推广和实施，让当今世界愈发深刻体味到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这一“魅力”体现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推动了中华民族自身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开辟了强起来的新征程，而且日渐维护和推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根据不久前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统计数字，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是3%，其中，中国经济发展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约占1/3。不仅在经济贡献上，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倡导的促进全球治理的诸多倡议更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响应、认可与支持。正如印度学者、钦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D. S. 拉贾所指出的，2009年以来全世界对于中国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二：一是中国通过保持稳定经济增长、提升综合国力的能力而不断积攒的中国自信；二是中国不断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促进全球多极化格局不断形成而给各国带来的发展机遇^①。鉴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跃升，古巴拉美社甚至将2017年

^① “China under Xi Jinping - A New Trend in Foreign Policy?”,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node/1754>.

视为“中国国际地位增强年”。

国外学者普遍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治国理政的优异成绩是当今世界最吸人眼球的重大事件，“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国外学者们的基本判断是，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正在重塑整个世界。他们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最大特点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大幅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杰弗里·巴德^①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入手，按照历史顺序，分析了毛泽东的“敌对国际秩序”、邓小平的“融入国际秩序”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延续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政策演进。他指出，相比于之前的任何时期，今天习近平所主政的中国是一个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成就基础上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跃升，中国有了更强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来改造这个国际秩序。有学者则通过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路径来论证“新时代”的特性，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世界的习近平“新时代”已经开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韩国学者宋大元指出^②，习近平“新时代”已经开启，原因在于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展现出新的侧重点和发展方向：第一，相比于邓小平强调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更加强调平衡式的增长，既注重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又强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第二，相比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依赖廉价的产品和劳动力水平，习近平更加强调科技创新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第三，相比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法治建设不健全的情况，习近平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大力推进反腐败事业，这与西方国家的依法治国完全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持这一观点的国外学者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过去五年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如主办多场主场外交活动以及对东海、南海领土主权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的强势应对等，具有跨时代的伟大意义，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习近平时代”的到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中国当代史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华志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将是中国史的一个崭新的阶段。他指出，西方历史学家通常把新中国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和“改革时代”（1979年至今）。现在，可能要加上一个新时代，即“习近平时代”^③。

我们看到，杰弗里·巴德从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来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最新特点，论证了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拥有更强的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来改造当今国际秩序；韩国学者宋大元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视角来进行研究，将习近平新时代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进行了比较，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已经开启的原因。他们的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不论是杰弗里·巴德、宋大元，还是华志坚，他们都是长期关注中国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所做出的结论基于他们长期的跟踪研究，不管他们的主观立场和对中国日渐强大这一事实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他们都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全球政治经济的最新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的五年里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今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

① Jeffrey A. Bader “How Xi Jinping Sees the World ... and Why”, *Asia Working Group Paper 2*, February 2016.

② Son Daekwon, “Xi Jinping Thought Vs. Deng Xiaoping Theory”,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xi-jinping-thought-vs-deng-xiaoping-theory/>.

③ “‘A Huge Deal’ for China as the Era of Xi Jinping Thought Begi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19/huge-deal-china-era-of-xi-jinping-thought-politics>.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①。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未来的中国发展不仅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将集全党、全国和全体人民的智慧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着力提高中国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也将促使全球发展进入“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不是其他国家经验、道路和模式，而是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日渐成为未来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参考系”和“指向标”，一个更加自信、自立、自为、自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指引全球的发展方向。

二、重大变化：从“韬光养晦”到“更加积极有为”

长期关注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国外学者们一直保持着其特有的敏感性和关注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撰文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即将改变过去“韬光养晦”的形象，转而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国家形象呈现在世界民族之林。印度学者马哈拉科什米·加纳帕蒂在《习近平2.0：让中国再一次强大》^②一文中指出，对于世界来说，中共十九大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明确，即中国将不再坚守邓小平所确立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而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不断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抵制西方民主理念，组织和团结全国人民，把中国建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给世界发展中国家带来替代性的“中国方案”。韩国学者宋大元也指出^③，相比于邓小平时代所强调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理念，习近平更加强调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并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他引用习近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将积极发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作用。

“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在外国学者看来，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二是习近平这一享有巨大威望的中国领袖的出现，促成了“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他们认为，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腐败，改善民生，加上推进军队体制改革和加强党对国家军事力量的集中领导，习近平治国理政新实践深得民心，使其政治威望达到新的高度，同时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内部团结进一步加强。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莫凯歌在文章中指出^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团结一致，更加强大。习近平所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不是其一个人的思想成果，而是新的领导集体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理论创新的成果，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专政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共识。作者认为，习近平必须为中国未来5年的经济发展负责。如果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最终克服国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习近平的功绩将永存青史。另一方面，他们指出，随着政治威望的提升和人民群众支持率的不断攀升，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理念得到更加容

① 习近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

② “Xi Jinping 2.0: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 <https://swarajyamag.com/world/xi-jinping-20-making-china-great-again>.

③ Son Daekwon, “Xi Jinping Thought Vs. Deng Xiaoping Theory”,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xi-jinping-thought-vs-deng-xiaoping-theory/>.

④ “Xi Jinping: Strongman Among Rivals”, <https://cpianalysis.org/2017/12/05/xi-jinping-strongman-among-rivals/>.

易和顺畅的实施。

我们看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出现的变化，其反应是过于敏感的，他们普遍认为习近平主政下的外交政策将实现彻底性的变革，这种判断显然有些武断了。实际上，从外交政策的内在延续性上看，中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所呈现的积极有为并没有根本上脱离或违背长期以来中国外交所坚持的基本方针，恰恰是过去我国长期秉承的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只不过是站在新的时代潮头，把握历史方向，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大部分国外学者持喜闻乐见的立场和态度来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更加积极有为”，如前所述，印度学者马哈拉科什米·加纳帕蒂就认为，这将给世界发展中国家带来替代性的“中国方案”。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防的是某些国外学者将“更加积极有为”同“搞霸权主义”画等号。事实上，我们的积极有为不是为了谋求地区性或世界性霸权，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自身发展，服务于全球治理，服务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军事在周边海域、争议岛屿和边境等地区的积极应对是自卫性质的，完全是一种旨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的正义性行为。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对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任何人都不应该误读，更不应该曲解。人间自有公道在！”^① 有些西方学者在具体叙述中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显然过于渲染问题的严重性，带有某种立场上的偏见。一些国外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伊藤刚所指出的，“有关当代中国的‘威胁论’带有政策导向的研究，往往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不过是一种‘虚像’的反映”^②。

三、主要目标：谋求全球影响力

依据对“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判断和重大变化的分析，国外学者运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他们普遍认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将是谋求全球影响力。而有少数学者依然坚持所谓“中国霸权论”。

国外学者们指出，在谋求全球影响力方面，近年来中国外交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他们认为，中国主要是通过推广中国的“政治理念”和国际战略，力图通过由国家主导的国际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英国利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金斯利·埃德尼指出，相比于以往中共领导人强调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外交更加强调中国“政治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积极组织世界互联网大会，向全世界推介其“网络主权”的政治理念^③。按照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凯瑞·布朗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倡导并建立的“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其实是为了更进一步维护中国在周边区域内的中心位置，通过经济联系进而扩大政治影响和外交影响的举措^④。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丽萨·法伦也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理念的最大特征是要重塑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既可以给美、日的亚洲方案带来挑战，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② [日]伊藤刚：《围绕“权力”与“力量”展开：从“特殊”论到“普通国家”论——比较政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内政外交》，吴茂松译，《当代日本中国研究》2014年第1期。

③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Soft Power under Xi Jinping”，<https://cpianalysis.org/2016/04/05/chinas-soft-power-under-xi-jinping/>。

④ “The Critical Transition: China’s Priorities for 2021”，<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ations/research/2017-02-02-critical-transition-china-priorities-2021-brown.pdf>。

同时也会对欧盟的政策走向产生深远影响^①。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罗马尼亚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亚·布伦泽亚，他在《中国：从熊猫外交到“一带一路”巧实力》一文中指出，过去，熊猫外交一直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战略，而现在，“一带一路”是中国新型的巧实力战略，它是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融合，目标在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铺平道路^②。

那么“新时代”中国外交谋求全球影响力是不是等同于谋取全球霸权？中国的迅速强大与美国的霸主地位将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方面都是国外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学者依然坚持冷战思维和所谓全球争霸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称为与美国争夺霸权的战略。比如，曾任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中国问题顾问的白邦瑞在其2015年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称“中国梦”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此外，美国学者拉亚·科雷在《哈佛政治评论》中的一篇文章则使用了“中国特色的巧实力战略”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应对钓鱼岛、南海等领土争端问题中的立场和做法。作者指出，“中国特色的巧实力战略”基于三大要素：习近平的坚定立场和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凝聚力，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所谓“不以任何政治条件相要挟”的原则。作者在文中使用了“自吹自擂”“惯用伎俩”等词汇来分析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理念和政策，他所提出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的巧实力战略”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文章的政治立场非常清晰，文章的分析旨在提醒美国政府，中国近些年来的“巧实力战略”将会谋求其在亚洲的霸权，进而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③。

而许多美国学者采取冷静思考、相对中立和较为审慎的立场来看待这些问题。比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研究员托尼·赛奇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梦想着什么？》一文中就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世界最大经济体不仅不是西方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政治制度也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此外，他指出，当今世界格局面临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势头，即中国在亚洲经济中处于中心国家的局面与亚洲安全依赖于美国军事力量的矛盾性局面并存。这给中国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既要求中国的领导人明确中国在领土主权上更加坚定的立场，又要就银行和金融调控、贸易和投资协议、气候变化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表明态度和决心。随着中国日渐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角色，这要求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不断向国际社会明确其下一步的政策走向和战略意图，同时要求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既关心全球问题，又关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关于这一问题，他认为，习近平很有魄力，他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我们看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不寻求领导权的政策理念已经被习近平寻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理念所取代。这表明中国越来越乐意从美国退出的领域里获得全球领导权，同时纠正与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总体上看，国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将不断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这符合中国政府近些年来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的理论主张和实践逻辑。的确，2016年7月2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①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7c1e6325016e1eb7935512b/t/57f68f49d482e94753c3def2/1475776345207/FallonNewSilkRoad-5.pdf>.

② Andreea Brînză, “China: from Panda Diplomacy to New Silk Road Smart Power”, <http://risap.ro/en/china-panda-diplomacy-new-silk-road-smart-power/>.

③ Raya Koreh, “The Chinese Smart Power Strategy”, <http://harvardpolitics.com/world/chinese-smart-power-strategy/>.

就曾强调要“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①。但“谋求全球影响力”不等于“谋求全球霸主地位”，中国外交一直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目标是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绝不是谋求全球霸权。“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②，这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许多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谨慎和理性的学术态度，这与某些西方政客动辄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断将“国强必霸”的逻辑强行套向中国的做法有所差异。

四、实施策略：推进新型“统一战线”

国外学者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实施策略是推进构建新型“统一战线”。他们认为依据不同时代主题和形势，组建不同形式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都始终坚持的策略方针。他们指出，近年来中国外交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恢复和继续发扬这一革命时期的“传统”。例如，新西兰学者安妮·玛丽·布莱迪指出^③，“统一战线”一词来源于列宁主义，她在回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推进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着重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主要策略，她认为，习近平是近年来加速中国外交进程、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核心人物。她指出，按照约瑟夫·奈对于软实力的定义，习近平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影响他国政府的决策进程，习近平继承和延续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基本外交主张，但在推进中国国际影响力建设方面呈现更强的信心。她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在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中国则正在引导“全球化2.0版”的生成，本质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习近平“新时代”推进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有：第一，“汇集侨智、发挥侨力”。注重侨务社团工作，建立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鼓励华人参政。第二，让外国服务于中国。习近平再次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通过开展党际外交、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友好城市等。第三，“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话语，推进海外华文媒体融合，争夺国际话语权。第四，“一带一路”。中国带头倡议建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合作模式，力图“超越意识形态”并将重塑全球秩序。

我们看到，安妮·玛丽·布莱迪所做的上述分析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政治策略，即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这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但如果认为“全球化2.0版”的本质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经济秩序，就有些问题了。实际上，当今中国所积极主张和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绝不是“一家独大”，而是追求实现共赢共享，促进全球治理格局的民主性和平等性。至于所谓“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经济秩序，目前来说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道路和意识形态之争不会终止，甚至在今天愈加激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④。当今时代，中国外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5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6-447页。

③ “Magic Weapons: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ivities under Xi Jinping”,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or_website_magicweaponsanne-mariesbradyseptember2017.pdf.

④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主张依然面临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新帝国主义、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论调的冲击和污蔑。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仍将继续。

事实上，中国外交所积极构建的新型“统一战线”是一种以自身发展为表率，以寻求全球最大共识为路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国际关系新主张，这一主张基于最朴素的理念——“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①。以往国外学者更加喜欢通过软实力视角来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策略，比如许多学者曾经着重研究中国文化战略尤其是孔子学院在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语言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国际战略的实施。而现在，他们更加务实地将注意力转向中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上，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外交以更加主动、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方式来推进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深刻体会到“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根据中国改革与发展委员会2017年11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境内投资者设立对外投资企业3.72万家，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2014年以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与相关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项目近2000个。

五、“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国外学者看来，“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其外交层面本身，同时也受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如杰弗里·巴德指出的，从外交层面本身来讲，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向当前国际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即中国将既拓展和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将强化中国在朝鲜半岛、南海、中亚等地区战略影响力。他判断，习近平主政的中国将一方面尊重对自身经济发展有利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但另一方面，对于不利于本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将采取冷漠或敌视的态度，目的在于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总体上看，这种判断基本准确，中国将继续支持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主张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进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和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同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主义等。

一些国外学者采取谨慎的态度和立场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他们理性地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实施面临着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诸多压力和挑战，其中主要有经济增速放缓、贫富差距、腐败、环境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季北慈指出^②，虽然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面临着诸多国内挑战。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政策的不确定性，过去依赖于国家主导的经济方针难以为继，必须更多依赖于效率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随着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到2025年中国将有1/4的人口即3.67亿人超过60岁，这将带来极大的社会压力。三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虽然习近平大力反腐败，但这一问题依然严重。201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中国受访者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5页。

② Bates Gill, “China’s Future under Xi Jinping: Challenges Ahead”, *Political Science*, Vol. 69, 2017.

为“腐败”是“极大”或者“很大”的社会问题。四是收入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愈演愈烈。五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当这些环境问题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时将会升级成为政治问题。此外，日本财政部政策研究所学者田中治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和“既得利益集团”等难题^①。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党自身也有清醒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绩的同时，罗列了中华民族复兴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将有利于外交政策的稳定、延续和发展。

六、结束语

总体上看，国外学术界对“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从不同的政治立场、阶级观点出发，采取不同研究视角，对我国外交政策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其中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问题时能够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秉承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基于客观和中立的立场，形成了一系列科学性的认识和判断。这些客观和理性的观点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不过，还有部分别有用心心的所谓“学者”固守冷战思维，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出谋划策，这些论断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警惕。

启示一：必须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国外学者关于“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正在重塑世界”的判断让我们完全有理由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让国人自豪，让世人惊叹，那些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都已不攻自破，成为历史的笑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只要我们继续坚定“四个自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步走”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必将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奋进中最终实现。

启示二：必须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将“中国智慧和方案”的内涵和起源讲清楚，尤其是要将中国重大的外交主张和外交战略的性质和目的讲清楚。当前“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战略需求。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发展贡献给世界经济的不仅仅是发展的“顺风车”和不断增长的全球贡献率，而且“更加积极有为”地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无比珍贵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将“中国智慧和方案”的内涵和起源讲清楚。近些年来，我们所提出的重大外交主张和战略的性质和目的，绝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公义”。“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是 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后为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伟大战略，是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基础上的合作共赢，可以说是“功在中华，利在寰宇”，目前已经获得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理解和支持。但对于有些国家来说，还属于新事物和新情况，它们有时候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会心生徘徊，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刻意丑化中迷失了辨别的标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外交新主张进行精心宣传和报道，尤其是要讲明白“中国智慧和方案”所带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蕴含的中华民

^① Osamu Tanaka, “Economic Reform and Economic Policy of the Xi Jinping Leadership”, http://www.mof.go.jp/english/pri-publication/pp_review/ppr027/ppr027a.pdf.

族追求“大同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文化情怀，使世界各国民众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为世界各国“释疑解惑”，使它们普遍认识到“中国智慧和方案”是一种发展和强大的智慧，是一种能够帮助许多民族和国家既能够加快发展又可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新方案，同时在实际的政策落实中，让广大积极响应和参与的国家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启示三：如何消除偏见，向世界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不是谋求霸权主义，是当前我国外交话语权需要的重大问题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西方世界秉承国强必霸的理论，将中国视为新的威胁和挑战。虽然中国政府多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并身体力行地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但总有一些国家和群体刻意放大中国军事力量和军队改革的威胁，甚至将中国列为“流氓国家”。这是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难题。习近平指出：“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些人开始担心，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偏见往往最难消除。”^①正如前文所述的美国学者白邦瑞和拉亚·科雷等人一样，他们往往站在美国利益的狭隘立场上，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出谋划策，可以说，他们真正的身份并不是学者，而是某些政治家背后的“幕僚”。他们文章中掺杂的陈旧的抑或是“变装”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此外，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所谓国外“学者”长期“善于”使用“权力争斗”“宫廷纷争”等方式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完全超出理性和学术讨论的范畴，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政治描绘成一部黑暗的内部斗争史，转变成恶毒的人身攻击和形象污化，其目的在于试图搅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肃纪所赢得党心、民心和良好的政治局面，进而阻碍甚至搅黄“新时代”战略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学术分析中严加甄别。

参考文献：

- [1] Willy Wo-Lap Lam, “Xi Jinping: A 21st-century Mao?”,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features/xi-jinping-a-21st-century-mao>.
- [2] Christopher K. Johnson and Scott Kennedy, “Now China’s ‘Core’ Leader, Xi Jinping Looks to Dominate Leadership Shuffle,” *CSIS Critical Questions*, October 28, 2016.
- [3] 辛向阳：《五个终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 [4] 刘军：《新时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目标》，《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 [5] 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基本框架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

（编辑：张晓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4页。